

· 动态与访谈 ·

个体、社会、未来

——西方哲学家论新冠疫情的影响^①

江 怡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整个世界的正常活动，给全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自然灾害，威胁到全球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面对这样一场重大灾难，现代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以及如何面对人类的未来，这样一些重要问题都被严峻地摆到了人类面前。西方哲学家们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对这场疫情有所反应，以哲学家特有的思维方式反思疫情给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据我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我希望在这里能够展现西方哲学家们的思考结果，并对这些思考作出一些基本分析。

一、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的最初反应

用观念的方式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具体状况，这是哲学工作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的直接反应就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博客上发表意见。这些构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西方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作出最初反应的主要方式。

早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索洛维奇·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在德国《世界》(Welt) 杂志发表文章，对最初出现的疫情表示关注，并明确表达出对疫情造成恐慌的担忧。2 月 26 日，著名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在意大利杂志《任何》(Quodlibet) 上发表的文章《传染病的发明》提出一

作者简介：江怡，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① 本文最初来自我受邀参加 2020 年 5 月 28 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云端会议“新冠疫情时代的哲学反思与心理调适”分会场“新冠灾害之时的科学与文化审视”所作的报告。感谢报告评论人陈亚军教授的点评和会议主持人朱志方教授的评论，感谢报告会参与者对报告内容提出的问题。

种观点：流行病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的恐慌现象，而这种恐慌现象与其说是因为流行病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例外状况”成了控制社会和人类活动的一种借口，用这种例外实现对社会的支配，政府可以以安全为借口而实行对自由的限制。^①阿甘本的这个观点引发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批评与讨论——例如，南希（J-L. Nancy）对阿甘本的虚构论提出了批评，洛奇（Rocco Ronchi）则对阿甘本的批判者作出了回应。^②阿甘本的担忧是，政府权力是否会在这场疫情中得到毫无约束的扩张。应当说，这种担忧正是西方哲学家们在考察新冠疫情影响时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欧洲心理分析杂志》于2020年3月30日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哲学家应当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特别围绕阿甘本的“例外状况”理论展开了批评。^③《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杂志也于4月29日发表文章，讨论了后数字时代的哲学与大流行之间的关系，焦点集中于福柯、阿甘本和齐泽克的不同观点。^④4月和5月，《亚洲和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连续两期发表专刊，围绕新冠疫情对医学和伦理学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⑤欧洲和北美的一些重要报刊和媒体也从2月底开始陆续发表著名哲学家的文章，直接反映了他们对新冠疫情的基本态度和主要观点。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一个激进主义出版社，逆言出版社（Verso Books）的博客中认为，流行病状况就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检查和反省机制。^⑥美国著名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则把新冠疫情与气候变暖结合起来，认为新冠疫情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碳排放造成的危害；他还认为，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将会使人类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因此禁止猎杀和食用野生动物应当是全球性的行动。^⑦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关于新冠病毒所知道的比我们不知道的还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这不仅需要我们对我们所知的东西保持谨慎态度，更要去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① G. Aganben, “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 in *Quodlibet*, February 26, 2020.

② J-L. Nancy, “Viral Exception”, in *Antinomie*, February 27, 2020; Rocco Ronchi, “The Virtue of the Viru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March 14, 2020.

③ Foucault, Aganben, Nancy, Esposito, Benvenuto, Diviedi, Mohan, Ronchi, Carlis, “Coronavirus and Philosopher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March 30, 2020.

④ Michael A. Peters, “Philosophy and Pandemic in the Postdigital Era: Foucault, Aganben, Žižek”, *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April 29, 2020.

⑤ *Eubios: Journal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Bioethics*, Vol. 30 (1—4). Issues entirely dedicated to Covid-19.

⑥ Alain Badiou,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Verso Blog*, March 23, 2020.

⑦ Peter Singer and Paola Caraliere “The Two Dark Sides of Covid-19”, in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8, 2020; Peter Singer and Michael Plant, “What Will the Pandemic Cure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in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6, 2020; Peter Singer and Kian Mintz-Woo, “Put a Place on Carbon Now!”, in *Project Syndicate*, May 7, 2020.

而产生认知上的恐慌。^①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德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目前的疫情恰好暴露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疫情就变成了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②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杂志》《波士顿评论》、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以及瑞士的《新苏黎世报》等都发表了许多哲学家的评论文章,对新冠疫情的社会影响作了哲学上的分析思考。

在著作出版方面,最早出版的图书应当是2020年5月8日齐泽克的《大流行:新冠震撼了世界》。^③该书作者被看作“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他以其敏锐的视角,用非理论化的方式,表达了对当下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几个主要看法:其一,从现象上分析,恐慌具有自身的逻辑。人们的恐慌心理大多是由于对信息来源的权威性缺少信任,因而导致谣言最终变成现实。其二,“非典”之后我们就不断被告知更为严重的流行病即将到来,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当疫情到来之时,我们就感到措手不及。这表明,所有的预测都只有在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时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三,疫情流行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限度,而且标志着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致命限度。尤其是在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明哲保身。这是一个现实的悖论:一方面,为了控制疫情流行,每个国家都必须首先自保;但另一方面,要真正战胜疫情,各国之间又必须精诚合作,团结协作。其四,重新反思“适者生存”的严酷规律,思考如何在当前条件下实现社会公平原则,由此重新引入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者,齐泽克在书中表达的思想代表性地反映了他一贯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对共产主义的积极推崇。虽然他的这个公众形象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但他对新冠疫情的哲学反思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反响。与阿甘本一样,齐泽克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表达他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反思。例如,在《新苏黎世报》上,他指出,经过新冠疫情,人类将不再恢复到从前,这就是新冠疫情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训;在《批判探究》博客上,他认为,人类面孔的野蛮将会是人类的命运。^④所有这些都表明,齐泽克是西方哲学家中对新冠疫情最早的反思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之一。

① Markus Schwering, “Habermas on Corona: There Never Was this Much Knowing about not Knowing”,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April 10, 2020.

② Michael Sandel, “Are We All in This Together, Inequality in America”,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20.

③ Slavoj Žižek, *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 O/R Books, published on May 8, 2020.

④ S. Žižek, “Man Will No Longer Be the Same”,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March 13, 2020; S. Žižek, “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 in *Critical Inquiry Blog*, March 18, 2020.

二、西方哲学家讨论新冠疫情影响的主要哲学领域和问题

从西方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影响的论述看，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涉及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研究领域，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哲学研究领域的角度，审视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和观点。

（一）本体论领域

虽然新冠病毒的发现和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医学和流行病学上的重大事件，但哲学家们对这场疫情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医学科学上，而是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了人类存在的规定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心理与人类行为的关系以及生存与死亡的关系等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

1. 人类存在的规定性：个体与他者的关系

正如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流行病传播一样，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首要冲击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挑战。哲学家们对这种挑战给出的回答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积极应对，用科学的方法面对病毒带给人们的伤害，以积极的配合处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另一种态度则是处之泰然，以安抚心灵的慰藉面对身体上的创伤，用平静的心态面对这场危机。第一种态度主要反映在《亚洲和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在2020年4月和5月出版的两期专号上，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商讨如何面对疫情给人类生命造成的危险。第二种态度的代表是美国哲学家克里切利(Simon Critchley)2020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做哲学就是要学会如何死亡》。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哲学的安慰就在于摆脱否定死亡的日常生活习惯，以清醒的勇气和清晰的现实主义面对局势的焦虑。^①这种看似消极的面对，其实正是哲学能够为普通人提供的心灵安慰所在。

面对这场新冠疫情，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是在社会中的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人们在自我隔离中满足他者对自我的约束。已经有哲学家指出，由于疫情而不得不自我隔离造成了人类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从而促成人类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疫情造成的自我隔离不过是暂时的防疫措施，但长期的隔离导致了人们心态的变化，甚至产生厌世心理。这恰好是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互冲突，并可能造成社会更大的恐慌。他者的存在原本是个体存在的根据，但在隔离中，个体由于缺少与他者的互动，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个体自我认知的丧失，最后使得社会失去了对个体的凝聚力。从哲学上解读，这种长期的自我隔离，直接导致个体丧失对社会的认同感，并疏离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原本密切的（事实上应当

^① Simon Critchley, "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20.

是必不可少的)关系。^①

2. 人类与自然: 人类与病毒的长期共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本次新冠病毒的严重危害使得人们无法完全避免这种病毒,即使是有可预防的疫苗,也很难使人类彻底消除这种病毒。这种危害不仅表现在其强大的可变异性和季节性,更在于它与现代人类活动方式密切相关。这就引发了哲学家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这不仅是消极应对和退守式面对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变化,更是以积极方式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主动提出有效措施以保证人类对自然和一切生命的尊重,阻止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这些观念在辛格等伦理学家的论述中得到充分表达,他们不仅提出了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尊重和同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而且把这一原则用于解释目前被视为一切真理来源的自然科学,强调对科学的社会地位的重新认识,即好的科学或许会带来坏的结果。^②

正如科学家们指出的,由于新冠病毒的特殊性,人类或许在未来必须与病毒长期共存,哲学家们对此也深感认同,并提出了不同理解。虽然病毒是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要敌人,但“与敌共舞”的心态恰好反映了哲学家们对人类存在意义本身的认识。阿甘本和南希都明确地表达了,在这场疫情中我们需要对人类的存在意义作出重新理解。从尊重生命的意义上看,人类需要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重新作出评价,由此引发人类对自身活动效果的反思。从人类存在的意义上看,人类本身就始终与其他生命体共存,并在这种共存中不断增强、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与病毒的共存并非人类的危险,而是人类的命运。^③

3. 人类心理与人类行为: 恐慌心理如何影响人类行为

不同于科学家们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哲学家们的反应不是在病毒的危害上,而是在人类的心理上。与病毒的传播影响不同,恐惧的传播往往是与人们的认知有关,与人们获得的相关信息有关。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恐惧有着自身的逻辑。例如,当社会上传播卫生纸脱销的谣言,政府却在反复宣传有足够的供应,这时候人们往往是涌向市场购买卫生纸,结果导致卫生纸真的脱销。这表明,人们的恐惧会直接导致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哲学家们在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特别注意到人们行为的变化,也就是恐惧心理导致的行为后果。事实上,面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哲学家们的目光不是聚集在当下的危机状况,而是聚集在人类未来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即使没有恐惧,这场疫情也已经足以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生活方

① Vafa Ghazari, “Ethics at a Distance”, in *Boston Review*, April 21, 2020.

② Marc Lipstich, “Good Science Is Good Science”, in *Boston Review*, May 12, 2020.

③ G. Aganben, “We are Merely Naked Life”,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March 17, 2020; J-L. Nacy and Shaj Mohan, “Our Mysterious Being”, in *The Philosophical Salon*, April 13, 2020.

式。因此，哲学家们更加关心的是，在这场疫情之后人们会如何生活，人类社会又会以何种方式存在。

4. 生存与死亡：面对死亡的态度

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必须时刻面对死亡问题。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哲学家们必须直接面对。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对死亡问题的回答远比其他人为直截了当。在这场疫情面前，哲学家们更是表现出无畏的态度，正如克里切利的文章题目所言，做哲学就是要去学习如何死亡。

面对死亡威胁，哲学家们虽然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可以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当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超过对生命的眷恋，哲学恰好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社会认同的珍贵，更好地处理自己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自爱尔兰的哲学家们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逐渐拾起对珍惜生命的渴望和对死亡恐惧的拒斥，还会逐渐增强对他人的信任和依赖，因为没有医生和专家的帮助，面对死亡或许就会更加无助。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不要伤害”不仅应当广泛地运用于医学救助，更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哲学家们还引述了西蒙·德·波伏娃的著名观点，认为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的存在，生活不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而是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一种存在的条件。这意味着，每个人的自我隔离其实就是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条件。我们的存在就是他人存在的现实，因而每个人都共享相互的责任。拒绝为防止病毒扩散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就要为糟糕的状况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为他人承担的，而是为我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我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本身。^①

（二）认识论领域

这场新冠疫情的暴发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疫情的传播又是如此迅速和广泛，更是让人们陷入恐慌。但这种恐慌的产生，正如前面指出的，主要是由于对病毒和疫情的相关信息了解不足，或者说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社会心理结果。这就引发了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的认识论关注，特别是从认识的限度、真相与谎言、理解与误解、认识的过程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1. 认识的限度：所知与未知

齐泽克在《大流行》中指出，普遍恐慌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新冠病毒的知识了解不多，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人们产生心理恐慌情绪。随后，更多哲学家撰文指出，我们目前所知的信息远比我们认为是所知的信息要少得多；我们往往会以我们所知信息对目前状况作出判断，这样的判断必然会由于信息缺失而失去准确

^① Joe Humphreys, “Coronavirus: How Can Philosophy Help Us in This Time of Crisis?”, in *The Irish Times*, March 26, 2020.

性。例如,许多人根据网上未经证实来源可靠性的信息作出片面判断,而后被证实为错误的判断已经导致了错误的行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抢购。但哲学家们更为关注的则是无知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安哥纳(Erik Angner)在《行为科学家》网站上发表文章,引用达尔文的经典观点“无知会比知识更为通常地带来确信”,认为这个观点有助于清醒了解目前我们对新冠疫情信息的认知状态。我们关于疫情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有些信息真假难辨。面对每天浪潮般的资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按照这些信息提供的要求去行动,而是对这些信息作出理性分析,辨别信息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以无知来应对貌似有知的个人或组织。过分确信恰好来自缺少对信息来源的正确判断,这被称作“心理偏见之母”。专家的最大特征不在于对某个特定事物或事件拥有比他人更多的知识,而是在于知道这种知识的限度,也就是知道哪里是我们所知的边界。“无知”而非“无畏”,才是拥有知识的最终标志。这就应验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无知”。安哥纳认为,这种认知上的谦逊构成了一种理智德性,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知识总是局部的和不完全的,因而需要更多的新的证据。^①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冠疫情的认识论视角。

2. 真相与谎言: 获得信息的渠道与方式

当然,与知识的不完备相比,信息的虚假对我们认识真相的危害更为严重。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场疫情暴发初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每天收到海量信息却无法判断真伪,尤其是许多后来被验证为虚假信息的内容最初依然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严重后果是直接导致社会动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何在面对各种无法辨别真伪的信息时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这些成为哲学家们面对新冠疫情时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哲学家们最初的反应是,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甚至相信政府。但由于专家和政府披露的信息在后来的事实中并没有得到证实,因而引起了普通大众对专家和政府的不信任。哲学家们就进一步从真相与谎言的关系中指出了如何确认真相的方法,即如何确认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问题。例如,阿甘本和辛格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们所获得的信息的可靠程度。谣言止于智者,但并非每个流言都由智者终结。终止谣言的真正方式不是诉诸权威,而是给出可以检验的事实;揭穿谎言的真正方法不是说出真相,而是对谎言的荒谬层层击破。^②

^① Erik Angner, “Epistemic Humility—Knowing Your Limits in A Pandemic”, in *Behavioral Scientist*, April 13, 2020.

^② Peter Singer and Michael Plant, “When Will the Pandemic Cure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in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6, 2020; G. Agamben, “We Should Worry Less and Think More?”,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April 7, 2020.

根据国际公认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当我们没有得到更为确定和充分的科学证据时, 面对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 我们需要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 用以减少灾害危险和更多代价。这是一种处理不确定状况和突发危机的一般原则。事实上,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各国政府和地方组织都试图按照这个原则实施预防措施, 比如, 必要的交通阻断、人员隔离、公共场所封闭, 等等。从哲学上看, 这是一种消极的后果主义道德原则, 旨在减少危害, 而不是增加好的结果。虽然这一原则保障人们减少伤害, 但在具体措施实施中, 人们更多的是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和缺少更多信息而相信了谣言和谎言。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可信资讯和可靠证据, 帮助人们减少相信流言蜚语的可能性。^①

3. 理解与误解: 解释的理由和根据

要真正消除谣言和误解, 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对疫情信息作出正确的理解。这里的正确理解, 不是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公认解释, 而是对我们所知的信息能够作出合理分析, 从逻辑上排除错误的可能性, 并在社会中取得大家的信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不仅由于人们所获信息量太大而无法从中筛选出有价值部分, 而且由于人们对信息的可接受程度不同, 对各种解释就有不同态度。哲学家们试图在各种解释中给出更为合理的选择, 其中包括如何避免受到各种信息的控制而无法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 以及如何通过了解信息渠道而辨别信息的真伪, 等等。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哲学家们的解释并非被看作唯一正确的, 哲学家们也并非致力于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而是尝试通过对解释理由的合理分析, 提供能够找到解释根据的有效路径。例如, 英国牛津大学的加扎维(Vafa Ghazavi)在文章中对保存社交距离的伦理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以此论证保持社交距离在何种意义上是符合伦理要求的。^② 德国著名哲学家赫费(Otfried Höffe)也在采访中表示, 每个人的幸福并非由政府提供, 而是由每个人的自主行为决定的。^③

从认识论上论证解释根据的合理性, 这是哲学家们的重要工作。面对全球性的新冠疫情, 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专业角度分析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解释性论证的有效性以及给出根据的合理性等问题。在信息来源问题上, 齐泽克和阿甘本都曾直接批评了一些政府在信息发布和传播工作方面的失误, 特别是对普通大众的误导作用。在解释性论证问题上, 克里切利和桑德尔等人则分析了信息构成方式和应当采取的策略。在根据的合理性问题上, 辛格、巴迪欧和弗洛里迪等人都指出, 一切解释都应当出自我们对自身理性能力的确信。所有这些观点都指向了认识上的理解

① Aweek Bhattacharya and Foy Niker, “Philosophers’ Rundown o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n *Justice Everywhere*, April 20, 2020.

② Vafa Ghazavi, “Ethics at a Distance”, in *Boston Review*, April 21, 2020.

③ Michael Hesse, “Philosopher Otfried Höffe on the Coronavirus”,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April 15, 2020.

和认识过程问题。

4. 认识的过程：消除谣言的途径

认识上的理解是基于共同的理性能力，但认识的过程则是时间上的无限延续。围绕如何消除谣言，哲学家们提出以获得信息渠道和方式为标准，但最终消除谣言却需要时间验证。在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中，我们经历了逐渐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虽然病毒基因组已经得到确认，但如何预防和治疗新冠疾病，目前为止依然是人类面临的未解之谜。有科学家指出，即使我们制造出了新冠疫苗，也无法完全保障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病毒。如前所述，这种新冠病毒或许将会与人类共生共存。这些表明，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尚处于最初阶段，还不能说已经充分了解这种病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病毒以及疫情的各种谣言才会横行肆虐，还不排除出于某种特殊动机而被制造和传播的恶意谣言。面对这些谣言的出现，哲学家们给出的根除方法则是，“看过程，等时间告诉我们真相”^①。

这里的认识过程，主要是指对新冠病毒认识的阶段性解读，意识到目前对病毒的认识依然处于最初阶段。因此，任何关于这种病毒以及疫情的信息都应当被看作不完备的。相反，任何把对病毒和疫情的认识极端化和扩大化的理解和做法，都应当被视为不恰当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用于传播各类信息的当代新媒体和自媒体，凭其自身无法保障信息内容的准确可靠。哈贝马斯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无知有更多的认识。^②正是由于所有信息都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因而这里就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对相关问题的最后回答，甚至没有可以用于相信和接受的数字。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基于各种试错的不断进行的实验，最终的结果依然是不确定的。^③但我们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了这个病毒，也对新冠疫情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三）伦理学领域

应当说，西方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反思，更多地体现在伦理学领域，特别是在与人性相关的问题上，哲学家们提供的思考可以更好帮助人们去理解这场疫情给现代人类带来的伦理难题。这些难题主要包括：自我隔离的悖论、对动物伦理学的重新思考、个体与社会以及特例与常态的关系等。

1. 自我隔离的伦理学：他律与自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带给每个普通人的直接影响就是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根据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观念，自律与他律构成个人德性的重要内容。这种自

① Joe Humphreys, "Coronavirus: How Can Philosophy Help Us in This Time of Crisis?".

② Markus Schwering, "Habermas on Corona: There Never Was This Much Knowing About not Knowing".

③ Laetitia Lenel, "Public and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in *History of Knowledge*, May 13, 2020.

律是内在的要求，而不是外在的强迫，他律也是根据个人内在道德准则而得以实现的。然而，在面临病毒危险的疫情中，自律变成了他者的要求，自我隔离并非出自内心的自我行为，而是社会的强迫要求；而他律则成为必须接受的外在限制。这在哲学家看来似乎是难以接受的悖论。如何解释这种自我隔离的悖论，正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关注的问题。

加扎维在《保持距离的伦理学》中明确指出，芝诺悖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伦理悖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把我们向前推进，我们就没有在行动。事实上，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交往已经把我们与他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使得我们与他人心理上保持了距离。这种近与远的矛盾就是自律与他律的冲突。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出自自律的考虑，其中就已经包含了他律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自主行为就是以牺牲他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社会结构，即我们在归属他人时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在做一种正确的隔离，即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隔离。在这种自我隔离中，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每个人的自我价值。^①应当说，正是这种自律与他律的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自我隔离的道德悖论。

2. 动物伦理学：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动物

关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历来争论不休，食用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行动始终处于较量之中。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人们对食用野生动物还有所忌惮，那么疫情之后人们就更深刻认识到禁食野生动物的必要性。但是，哲学家们对这个争论的反应并非关注是否可以食用野生动物，而是关注野生动物的自然权利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野生动物。

美国著名哲学家辛格是动物伦理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全球动物保护组织“你可以拯救的生命”的发起人。2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动物权利的宣传，明确提出要为动物争取与人类平等的权利。在这场新冠疫情中，辛格在报刊媒体上多次发表文章，表达他对野生动物权利的关注。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辛格从2020年3月起发表多篇文章，讨论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在《新冠病毒的双面黑暗》一文中，辛格提出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在《对大流行的治愈比对疾病的治愈更为糟糕》中，辛格指出应当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回答大流行的治愈问题，而不是健康和财富。^②这些都使得辛格成为在这场新冠疫情流行中最为活跃的哲学家之一。

^① Vafa Ghazavi, “Ethics at a Distance”, in *Boston Review*, April 21, 2020.

^② Peter Singer and Paula Cavalieri, “The Two Dark Sides of COVID-19”; Peter Singer and Michael Plant, “When Will the Pandemic Cure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3. 个体与社会：两难冲突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哲学家们在这场疫情中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两者在新冠大流行中的冲突，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在疫情初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以每一个体必须服从社会整体要求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服从要求又是以保障个体生命健康的名义。然而，在这种要求下如何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似乎构成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个体只有服从了社会要求才能保障个体的生命健康（至少所有的宣传都是这样说的），但另一方面，社会要求个体服从又是以剥夺个体自由为前提的（这是实际出现的情况）。那么，我们如何处理这个两难选择呢？哲学家们的思考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齐泽克或许是对这个问题作出较早反思的哲学家之一。他在2020年3月13日发表于《新苏黎世报》上的文章，就对疫情之后我们能否还像过去一样看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我们难以回到过去。^①同月，在《批判探究》的博客上，他指出，在这场疫情中，所有以往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现实地发生了，这使得每个人都面临着极其不确定的未来。因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就迫使我们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产生了比以往更为焦虑的关注。根据他的分析，疫情可能带来的危害还不是暴力和公共秩序的破坏，而是这样一些暴力带有合理的人类模式，即社会以合法的方式使得这种暴力和无秩序变成了一种合法存在。这种暴力和无秩序表面上看是个体自由的张扬，实际上却是对个体自由的损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原则在当今的疫情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却是以牺牲个人的平等权利为代价的。^②齐泽克的观点也引发了一些哲学家的批评性反应，包括他所批评的阿甘本对他观点的反批评。^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反对政府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不同哲学家对这个立场也有不同观点，难以形成统一的看法。

4. 特例与常态：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围绕特例的争论来自阿甘本的著作《例外状况》（2005）。他在书中提出，20世纪的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把一些例外状况解释为常规状态，并用处理例外状况的临时措施管理国家和政府。当新冠疫情暴发，阿甘本把这也解释为例外状况，认为各国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个人的支配，并以此作为一种正常状况。但是，阿甘本的这种指责并没有得到西方哲学家们的支持，相

① S. Žižek, “Man Will No Longer Be the Same”.

② S. Žižek, “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 in *Critical Inquiring Blog*, March 18, 2020.

③ G. Agamben, “Clarifications”, in *Quodibet*, 17 March, 2020; G. Agamben, “We Should Worry Less and Think More”,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April 7, 2020.

反,不少哲学家(如齐泽克、南希等人)明确反对阿甘本的激进观点,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从哲学和伦理学上反思这场疫情的影响。

阿甘本在《一些澄清》中,对批评者的意见作了一些回应,试图表明他的观点并非完全针对某些国家政府,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思。他认为,疫情引发的恐慌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们的社会仅仅相信“赤裸的生命”。这种生命没有了通常的生命条件、社会关系、工作和友谊、情感和宗教信仰,而只是担心患病的危险。这种生命没有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而是把他们相分离。^①对此,齐泽克回应道:事情并非如此。这种生命观恰好把人们团结在了一起——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正是表明了对他人的尊重,因为我很可能就是病毒的携带者。亲人和朋友之间避免相见,并非是对失去自我生命的担心,而是对把病毒传染给亲人和朋友的担心。^②南希在《有害的例外》中指出,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反思应当是文化的和哲学的,而不是政治的,因为新冠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是全人类的,它涉及的不是各国政府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而是当今每个人如何处理这场疫情对自己生活和行为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要求政府更为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去阻止病毒的传播,但病毒最终落在每个人身上,需要我们去面对和处理。在处理这场疫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和社会还是个人,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独善其身并不能消除病毒。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我们才能真正打败病毒,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③

(四) 政治哲学领域

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流行病相比,这场新冠疫情暴发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表现为新冠病毒对人类而言前所未有的最为严重的致命性,而且表现为新冠病毒对全球而言前所未有的最为广泛的传播性。这种病毒的传播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传播途径之多,都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流行病,完全是人类始料不及的。面对这种后果最为严重、传播最为广泛的新冠病毒,当代社会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希望以尽快速度抑制病毒传播,以最大力量保护人类的生命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采取的各种措施无论是否奏效,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因而,如何认识这种影响,如何理解社会采取的这些措施,这些都成为每个人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理论焦点。这样,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政治哲学讨论自然就成为哲学家们的热点话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争论、疫情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政府的社会责任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社群与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

① G. Aganben, “Clarifications”.

② S. Žižek, “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

③ J-L. Nancy, “Viral Exception”.

1.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疫情的挑战

新冠疫情的影响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全球化问题。与以往流行病传播相比，这次疫情的传播如此迅速广泛与人类活动的全球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似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反思全球化给当代人类带来各种益处的同时（或许在某些观点看来全球化完全没有任何益处），人们更加担心的是疫情之后的全球化走向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争论，成为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讨论的焦点。

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全球化问题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商品、制造、消费以及再生产等等的全球化；在政治学家看来，全球化是人类政治活动的相互影响，互为牵制；但在哲学家看来，全球化则意味着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尽管如此，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次疫情传播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密切关联，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看法，但对于疫情后的全球化走向则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对后疫情的全球化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已经形成的全球市场不会由于疫情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政治学家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次疫情将改变整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更少开放，更少自由。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之前互赢互利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将更为独立自主。^① 哲学家们则对这种改变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指出，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无法改变全球化的事实，更无法让人类由此相互分离。相反，人们会由于这场疫情而更加珍惜与亲人、朋友和他人的密切联系，更加意识到相互交往和团结一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和自我封闭不过是人类生活的暂时现象，或者用葛兰西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新冠疫情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去全球化的开始，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将继续相互依赖，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②

2. 疫情下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同难同福

这场新冠疫情还暴露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在其中变得更为严峻。对此，不少报刊记者和专栏作者都对疫情中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作出了分析，结合历史事实和现实数据，说明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才是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应当得到的教训。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也对此早有认识。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桑德尔于4月13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我们都在一起吗？》，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源，特别是在这场疫情中突出了医疗资源的不平

① Ramzy Baroud and Romana Rubeo, "Will the Coronavirus Change the World?", in *Common Dreams*, April 26, 2020.

② Angel Alcalde and Jose M. Escribano, "Will Covid-19 End Globalisation?", in *Pursui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ress, May 16, 2020.

等。他指出,虽然近几十年来,主流政治家们竭力呼吁实现更大的机会均等,如改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其根源在于社会精英主义原则决定了精英高校在校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而且升职机会向精英阶层的倾斜也破坏了社会的团结。事实上,目前执政的精英并没有为没有大学学历的普通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就业保障。因而,社会平等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如何确保没有生活在专业阶层和特权阶层的美国人找到有尊严的工作,使得他们能够养家糊口,为社区作出贡献并赢得社会的尊重。这种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现象在疫情中暴露得更为明显。^①事实上,这正是今年5月底在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暴发的“黑人命贵”运动的深层原因。

来自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三位伦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卡伦(Randell Curren)、菲兹帕特里克(William Fitz Patrick)和特拉佐(Rosa Terlazzo)把目前的危机称作对未来的“唤醒召唤”。他们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道德两难:一方面,我们必须运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去治疗确诊病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收治所有的确诊病人。在处理这种两难问题时,最重要的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事与愿违。这不仅涉及社会结构对医疗资源的安排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整个社会对每个生命的尊重问题。这种尊重就是政府为每个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及避免对安全的已知威胁,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②

3. 政府的责任与个人的幸福:同舟共济

在这场疫情中,许多人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归结为政府的不公和不作为,因此针对政府的抗议和批评就显得格外突出。然而,哲学家们明确指出,虽然政府在控制病毒传播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这种控制活动带来的所有结果,更不需要为这场疫情中的每个人的幸福负责。相反,每个人都需要在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会距离中寻求个人权利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点,需要考察个人的道德选择与政府的行政措施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说,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政府的决策,而是个人的行为选择。虽然政府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但个人依然可以在可选择的范围内作出抉择。这个观点在德国著名哲学家赫费的访谈中得到了表达。^③

辛格和普朗特(Michael Plant)指出,人们的疫情心理恢复要远比疾病治疗更为困难。这里不仅存在一个“认定受害者效应”问题,即人们更愿意援助具体的已知受害者,而不是向规模较大、定义模糊的一群个体的每个人提供相同的帮助,而且

① Michael Sandel, “Are We All in this Togeth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20.

② Kethleen McGavery, “Ethicists: Covid-19 Shows Inequities in Structure of Society”, in *Futurity*, April 28, 2020.

③ Michael Hesse, “Philosopher Otfried Höffe on the Coronacrisis”.

存在“被拯救的生命”与“失去的GDP”之间的权衡选择问题。要打破这种“认定受害者效应”，确定“被拯救的生命”远比“失去的GDP”更为重要，这就需要政府和个人共同合作。我们不仅需要测算隔离和封锁给经济带来的成本，而且要看失业对个人带来的幸福丧失。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个体在疫情结束后的生活希望，也才能够评判政府的措施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①

4. 社群与共同体：何种未来

围绕社群在这场新冠疫情中的作用，不少哲学家都指出了社群和共同体的重要性，认为新冠疫情带给人们的最大教训就是重新认识了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无论是阿甘本还是齐泽克，或者是巴迪欧，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在疫情中不断为个人权利抗争的人们需要运用社群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个体的存在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被赋予社会的价值。这在阿甘本的例外状况理论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中都得到了体现。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人类在新冠疫情之后会有何种未来。

齐泽克指出，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人类的未来无法与过去相同。他试图由此说明，疫情之后的社会应当彻底摒弃资本主义的财富贪婪和金钱任性，重建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②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费恩(Lucas Fain)则认为，由于我们无法用当下定义未来，所以未来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一种开放的存在。这种开放不是对我们自己，而是对他者的开放。没有对他者的开放就没有未来，因而，这种未来就只能是一个集体的未来。^③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林志(Martin Lenz)针对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问题区分了两种不同看法，即持续论和中断论。前者认为，未来将与过去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应当为危机后的未来作好准备。后者则认为，未来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过去状况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手段和目标。从目前状况看，中断论似乎比持续论更多受到重视，因为后疫情时代或许正是新规范确立的时代。^④

三、观察与反思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家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反思全面深入，他们围绕个人、社会和未来的问题发表了许多富有洞见的重要观点。从研究领域看，这些反思涉及西方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从研究背景看，这些哲学家在哲学史、当代哲学、分析哲学、

① Peter Singer and Michael Plant, "When Will the Pandemic Cure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② S. Žižek, "Man Will No Longer Be the Same".

③ Lucas Fain, "There is no Future without Openness to the Other", in *Public Seminar*, May 14, 2020.

④ Martin Lenz, "Will the Future be like the Past? Making Sense of Experiencing in and of the Corona Crisis", in *Handing Ideas*, April 7, 2020.

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等领域都有建树，直接反映了他们的专业研究水平，表现出他们以专业能力对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类共同关心问题作出回应的职业精神和现实关怀。在这些反思中，齐泽克、阿甘本、哈贝马斯、乔姆斯基、辛格以及桑德尔等人的观点在国际社会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也最为广泛。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前主席、波士顿大学教授德·莫兰(Demont Moran)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马克思把批判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们对新冠疫情的批判性反思，正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并为在这个地球上建立美好未来而努力。哲学家们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哲学考察，将会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如友谊、家庭、社会参与等。未来的应对措施必须是保护日常的人类环境、我们彼此之间进行具身性互动的能力以及能够直接感受到彼此的情感反应，而不仅仅是通过技术介导我们的生活。由于这场危机，人们将重新关注具身性、移情、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等哲学主题，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运动的所有主题。^①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他指出，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我们要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坚信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②这些为我们战胜病毒提供了重要行为指南，也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家们对疫情影响的反思提供了重要思想依据。

(责任编辑：韦海波)

① 李念：《哲学家莫兰在美：疫情限制让人渴望拥抱，日常生活“万岁”》，载《文汇报》2020年4月20日。
②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一版。